

文化周刊

中华读书报

■本版编辑:赵晋华 ■美编:成一村 ■电话:010-67079073

■E-mail:dushubao@263.net 2021年9月8日

第549期

13

中国叙事与全球视野

关于中国叙事,我觉得要处理好两个主要问题。首先,在讨论叙事时候,如何协调中国作为国家的统一性和内部多样性之间的关系。中国国家在许多方面如经济规划、大型基础建设和当前抗疫斗争等方面都显示了举国体制的特征和力量,但用举国体制概括全部中国社会的特点又是片面的。在社会层面,存在着许多性质不同的空间。中国文化和、社会和经济等方面存在着多样性和不均衡性,即便从中央与地方关系来说,地方的自主思想权力也很大。毛泽东同志在1956年发表的《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应该把多样性呈现出来,把内部的各种成就和问题呈现出来,不至于让人们总是盲人摸象,看到一角就以是整体。这是我们面临的重要挑战。

我担任过《读书》杂志多年的编辑,那个时候有很多的思想争论和讨论,很多国外的知识分子和学者到了中国都愿意到《读书》来和中国知识界进行对话。这样的对话我觉得能够呈现声音的多样性和解释的可能性,因为他们可以听到不同的声音,并且直接面对面地争论。叙

事往往有一个绝对的叙述者,但对话是可以呈现出一个样貌和状态的,所以我觉得不只是一个单一的叙事问题,而是如何呈现中国的整体性和多样性的问题。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

第二,需要处理中国社会体制的独特性和全球性的问题。从根本上说,虽然中国和西方有非常大的差别,无论是社会体制、政治体制还是历史传统,但是面临的基本挑战是差得并不太多。生态的问题、抗疫和保障人民健康的问题、族群和宗教的矛盾、社会不平等、区域差别、科学技术促成的人类生活形态的巨变等等,这些问题是全球面临的基本问题,哪儿没有呢!但同样面对这些问题,不同国家的历史传统、基础和应对方式很不一样。到底哪些是全球性的问题,哪些是中国独特性问题?在这点上强调连带性和全球性是必要的,比如说族群和宗教冲突的问题,并不只是发生在中国,是全球性的问题,而许多地区的相关冲突,其激烈程度远超中国,更不用说从殖民时代延续至今的种族主义渗入欧美社会的肌体。

在新疆问题上,有许多社会因素,已经有许多学者做过分析。但阿富汗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之后整个区域的变化激化了区域内的族群和

宗教冲突,并促使一些原先持和平方式的团体向暴力方向转化,这些区域变迁对于中国也有影响。全球霸权在激化这些矛盾和冲突方面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更不用说,原教旨主义的兴起是一个全球现象,有深刻的根源。因此,这一地区的矛盾冲突不能够特殊化为一个单纯的中国问题。像这样的问题,我们应该指出独特性所在,重视危机爆发的内因,寻求解决之道,但同时也应该能够呈现出区域的和全球的连带性,有了连带性,才能呈现独特性。中国从未像霸权国家那样到处干涉内政,发动战争,我们对于国内问题的治理完全不同于美国的“反恐战争”。既相互连带,又很不同,因此需要用不同的概念来加以表述。这样不仅更具有说服力,也更有利于形成有效的应对方法和对话方式。

也在这个意义上,我个人认为中国的话语场受美国支配话语的影响太多,中国话语不宜于过多地或不加反思地接受西方媒体、甚至学术领域的流行说法。我刚才在外面说从殖民时代延续至今的种族主义渗入欧美社会的肌体。大国翻译成英文又都是 great powers, 或者 global powers。在19世纪、20世纪前期,提到西方列强,不就是所谓 great powers, Western powers 吗?

这些用语在当年就是殖民和帝国主义的代名词,西方社会科学的许多概念是深嵌在他们的历史中的。所以人们一听到“powers”就想到利益竞争和权力竞争,这也是西方历史记忆的后果吧?对于那些与中国一样经历过殖民或半殖民历史的社会而言,这些用语又意味着什么?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是“Global powers”的竞争吗?中国的疫苗国际主义是大国权力竞争吗?如果不是,背后的价值是什么?价值与用语是相互关联的,价值清晰了,用语也一定会变化。在上世纪60年代中国建设担赞铁路的时候,人们不会用 great power 来表述中国;我们今天学习了西方大量的知识,并用什么语言来表述我们的行动?不只是宣传的问题,也是价值取向的问题。我们在文明冲突、大国博弈、修昔底德陷阱、软实力、巧实力、硬实力上花了这么多精力,是否需要重新讨论西方话语陷阱的问题?是否需要认真思考基于不同价值尺度的表述方式?在谈论叙事的时候,我们需要自我设问。19世纪以降,我们就学习了西方大量的知识,并在实践中转化,收获很多,但在今天也应该问哪些是需要扬弃的?需要对这些知识进行辨别和思考。

还有一点,中国的叙述说给谁

■汪晖

听?我觉得中国媒体过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在美国和西方霸权身上,总是尝试说服美国与中国对话。当然,说服、对话总是好的,但说得再多,恐怕也改变不了西方主流媒体的那些说法。今天改变一点,明天又改回去了,因为这些说法服从其战略利益,又受制于其历史视野和学术生产的知识范式。因此,需要不同层次和方面的对话,也就需要在中国叙事的同时问一下跟谁对话、说给谁听的问题。

相比之下,中国对于邻国、亚非拉地区,所谓第三世界或全球南方,不仅话语不够,研究也非常不够。我们的疫苗国际主义也支持了欧洲一些国家,但主要就是対全球南方的,他们处境最困难,可是这些国家和地区在我们的话语实践中占据多少分量?迄今为止有关“一带一路”的讨论主要集中于经贸等领域,而很少涉及文化、社会与政治。中国缺少通晓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语言与文化的专家。我们知识界、我们的智库有多少精力和人才是研究这些地区的?我们的话语围着西方转,也就不能彰显中国这些行为的真正意义。自我叙述与对他人的理解是紧密相关的,如果我们只是通过西方的棱镜观察自己,这样的叙述得到的很可能只是扭曲的或至少是不完整的



形象。这就带来很大的问题。因此,在国内,深入研究中国社会内部多样性及其与统一性和开放性的关系,在国际,加强对于全球南方及其与中国关系的研究,都有助于形成关于中国的更为丰富的理解,进而把这些理解分享和传播出去。

最后一点,基础性的学术研究需要得到充分重视。即便在亚非拉地区,许多流行话语甚至教科书对中国的描述也主要基于西方媒体和学术对于中国的描述,在这方面,我们要做很多工作。谈论中国形象或对中国的理解不只是一般意义的话语和宣传问题,而是要做真正的基础研究,对于区域的研究、不同社会的研究、中国自身文化历史的研究,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形成真正具有说服力的,可以包含复杂性和多样性的中国话语。这个话语不应仅仅是关于中国的,也是关于世界的,能够为争取更加公平和平等的全球关系提供新的视野、框架、概念,并与不同地区同道者的话语相互呼应。

(本文依据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所长汪晖在全球化智库举办的中国与全球化论坛上的发言速记整理,现根据现场视频录音进行了校对,并经汪晖教授本人审阅,增订了部分内容。)

■丁爱博

诸多宫闱之乱事,如刘劭为篡夺帝位而杀父、宋孝武帝刘休龙(刘骏)乱伦、其女山阴公主淫荡(怨性别不平等,被允许纳男妃30人)。

可惜的是,关于南朝都城建康,没有像洛阳那样的文献。公元8世纪许嵩编撰的《建康实录》是一部六朝的编年史,有纪传的内容,但没有城市本身的描述。《世说新语》中许多有关上层社会的典故都发生在建康,尽管杨元慎对南朝人的生活有一些负面的议论,但《世说新语》反映的建康名士的生活还是相当精致和高雅的。刘淑芬综合分析了零散的文献之后,认为建康是一个繁忙的大都市,人口成分混杂,她引用《隋书》后得出结论,认为建康与洛阳、长安相似,人口和风俗都具有混合型的特质。正如刘淑芬和其他学者所示,建康与隋唐再次定都于此才获得新生。从当时人对北方文化和社会发展水平的一些议论中,可以发现自北魏建立以来的百年之中,社会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在《南齐书》的记载和詹纳尔(W.F.J.Jenner)翻译的《洛阳伽蓝记》引文中,将当时的首都(今天同)描绘为“虜”。宫殿里充斥着货物的制造与买卖,里坊居民中有大量的恶人和醉汉(导致了长达十年的禁酒),以鲜卑习俗敬神,太后与其女子鞍马卫队出行时并不遮面。相比之下,按照南朝人陈庆之的说法,洛阳是一个文明程度很高的地方,陈庆之曾访问洛阳的北魏朝廷,返回建康后有此类评论。他的评论见于杨街之的《洛阳伽蓝记》:“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所谓帝京翼翼,四方之则。”

乡村生活

将目光由城市转向乡村,我们可以感受到文献中屡见不鲜的民生之艰,它是这个混乱不堪、战争不断的年代农民必须面对的窘况。太和七年(公元483年),在北魏统治之下实施了“均田”令,一户平均可获得140亩地(一亩约合于1/6英亩),田亩数因时代不同而变化,还因年龄、奴婢和牛的数量、是否长期耕种的永业田(如桑田)而各有不同。此外,授田亩数还会定期调整,以适应户数的变化。但是也有资料提到,当时有占地千顷以上者,一顷即一百亩。至于中等之家,颜之推曾有如此议论:“常以二十口家,奴婢盛多,不可出二十人,良田十顷,堂室才蔽风雨,车马仅代杖策,蓄财数万,以拟吉凶急速。”

颜之推还对农业生产的重要性的官员的不重稼穡表达了强烈的愤慨:古人欲知稼穡之艰难,斯盖贵谷务本之道也。夫食为民生,民非食不生矣。三日不粒,父子不能相存。耕种之,莠锄之。刘获之,载积之,打拂之,簸扬之,凡几涉手而入仓廩,安可轻农事而贵末业哉?江南朝土,因晋中兴,南渡江,卒为羈旅,至今八九世,未有渡江,礼乐所不沾,宪章弗能革。虽复秦余汉罪,杂以华音,复闻楚言,不可改变。虽立君臣,上慢下暴。杨元慎接着又列举了南朝的

六朝的日常生活

六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具争议的时代,政权割据、战争频发、人口迁徙让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正是在这个所谓的“黑暗时期”,中国的艺术、技术、思想和文化都取得了巨大的创新和发展。丝绸之路不仅带来了外来货物,也带来了新的宗教和文化。得益于民族融合与南北差异,这一时期的服饰风格、饮食习惯、墓葬雕塑、音乐舞蹈等无不展现了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差异。

美国资深汉学家、美国早期中古中国学会创始人、斯坦福大学教授丁爱博认为,六朝是一段非常复杂的时期,对它进行任何“标签式概括”都不会很贴切。他以考古出土实物为基础,对照传世文献,既宏观阐述了六朝的政治与社会,又细致描绘了六朝的日常生活,展现了一幅全景式的六朝图卷。

何为“六朝”

六朝(公元3世纪至6世纪后期)是一个分裂和无序的时代,它处于汉、唐两个大一统王朝之间,以其在文化艺术上的伟大成就而著称。有人将中国与欧洲的历史进行对比,把六朝称为中国的“黑暗时期”,然而这个词所包含的负面意义很容易让人引起误解。实际上,六朝是在诸多方面(如文化、政治、社会、艺术与技术方面)都取得了巨大创新与成就的时代。

由于六朝并不是一个很受关注的时代,所以有必要勾勒一下这段历史的梗概。“六朝”之名来源于当时建都于今南京的六个政权。此前的都城都位于北方,主要在今天的西安和洛阳,但随着北方非汉族迁入中国北方并建立自己的政权,原来的中原政权被迫偏安于南方,于是这个时代被称为“南北朝”。外来的非汉人统治的北方政权,与移民占主体的南方王朝之间的政治分裂是这个时期的最显著特征,不过我们也不能因此认为当时的社会已经支离破碎了。相反,当时的地方割据政权都在力图自保与扩张,正是由此导致的冲突形成了当时的混乱无序。在欧洲,政权的割据被认为理所当然的事,而在中国,没有中央集权的政权会被视为反常的、暂时的。汉朝的成功大一统成为中国人心目中统一的典范,它通过近四百年的努力,在中国人心目中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政治规范。

汉代末期,朝廷外戚与宦官集团之间的纷争,使得一些军事领袖

成为独立的军阀,而皇帝成为这场新的政权争夺战中的傀儡。在北方,曹操于建安五年(公元200年)的官渡之战中击败袁绍,以胜利者的姿态脱颖而出,但他继续扩大胜利果实的企图受到了来自东南、西南地方军事首领的阻挠,紧接着是连年的军事行动与统一政权的行动。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曹操去世后,汉朝终于从名到实都灭亡了,曹操之子曹丕即位,建立了新的王朝“魏”,统治着中国北方地区。此后,四川的刘备因其姓氏(与汉代皇室相同)而自称汉朝的合法继承者,后世为区分称其为“蜀汉”。不久,东南的孙权也自称吴帝。至此,魏、蜀、吴三足鼎立局面正式形成。

曹操及其后继者统治下的北方政权巩固内部的进程并没有走得很远。汉末,中央政权由于衰微,不得不依靠地方势力来维护自身的稳定与安全,结果大型坞壁蜂拥而至。大型坞壁都拥有自己的武装(部曲)和家丁,他们是失去土地后依附于豪强的一群人,身份类似于佃农。数百年之后,中央政权的安全力量才得以重新建立,以家庭为单位、拥有小块土地的自由民形式也得以重新恢复。汉末,曹操还试图通过建立一套新的职官制度取代旧式的汉代官僚体系,以确保官员对社会制度的拥护,加强中央集权。他建立了一套乡里荐举体系,被荐举者分为一至九品,依品级高下委以不同的职务。为了确保优秀的候选人能够入仕,各州都负责品第的中正皆由中央政府任命。但是,由于是家族而不是个人把持着品第大权,入仕的门路逐渐被地方门阀世族垄断,这个制度也逐渐失去了原有的活力,于是知识精英受到打压,而维护世族特权的制度则根深蒂固。

司马氏是北方曹魏政权里的显赫家族之一,泰始元年(公元265年),司马炎逼魏帝退位,自称皇帝(晋武帝),晋王朝成功地实现了中国的短暂统一。西晋政权建立之前,蜀国已被魏吞并,西晋建立之后,又于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征服了吴国。新的晋王朝下达了“罢兵令”,曹魏的中央集权措施被搁置下来。尽管如此,西晋诸王还是保留了自己的私人武装,不久,严重的内战“永嘉之乱”(公元311年)爆发,并直接导致了晋王朝的瓦解。

当掌权者内讧之时,权力势必旁落他人之手。西晋诸王之间的内讧导致中央军力的削弱,中央再也

无力控制由半独立的军事首领控制的地方州郡,并最终导致饥荒、大规模的动乱和革命性的农民运动,这种现象正是汤因比(Arnold Toynbee)所称“动乱时代”的极好例证。

在西晋政权里,外部的威胁来自疆域内外的诸多非汉族民,他们颠覆了西晋王朝,控制了中国北方地区。随之,驻守南京的司马睿于建武元年(公元317年)以晋室的继承者身份称帝,因此建武元年之前的晋朝被称为西晋,继之者被称为东晋。正是由于晋室的南迁,这个分裂的时期才成了“南北朝”。

城市生活

受考古资料的局限,我们很难重构六朝时期的中国城市生活状况,除了一些城墙和城门基址,城市本身的遗存相当少。历史文献也无法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信息,因为它们关注的主要是宫廷和上层社会。比如,《郢中记》里有很多关于后赵统治者石虎的都城——郢的记载,但只记载了宫殿,如装饰、苑囿、后宫、朝臣、作坊等,对城市本身并无只言片语的记载。这个时期的另一部城市记录《洛阳伽蓝记》非常有名,是一部从北魏太和十七年至魏亡(公元493~534年)间关于洛阳的回忆录,成书于洛阳毁灭不久。正如书名所见,《洛阳伽蓝记》记录的重点是寺院,也有一些关于寺院的背景,如寺院机构、城市布局等。

洛阳作为北魏的都城,除政治方面的用途,并不具备经济功能。因此,这座城市拥有的巨大财富主要来自源于为宫廷和官军服务的贸易与手工业。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洛阳重建时,除了宫殿、皇家寺院和衙署,还包括周围的郊区,共有220个坊。坊的平均大小约三百步见方,每个坊都由四面开口的坊墙环绕,各有管理里坊的里正和门士。尽管如此,洛阳城内犯罪活动还是非常猖獗,无疑是由于里坊居民过于拥挤所致。到永熙三年(公元534年)洛阳崩溃之时,城里有1376所寺庙和尼姑庵,占据了全城1/3的面积。《洛阳伽蓝记》以大量篇幅描述了这些建筑的壮美景象,包括寺庙前林荫大道两旁的府邸、宽敞的佛殿和漂亮的苑囿。洛阳城的居民蜂拥而至,争相一睹壮观的庙宇和威严的佛像。

当掌权者内讧之时,权力势必旁落他人之手。西晋诸王之间的内讧导致中央军力的削弱,中央再也

剑、吐火等。讲究的葬礼一定也会吸引很多旁观的人。

较为富裕的洛阳居民一般居住于城内某些固定的区域,《洛阳伽蓝记》非常详细地描述了那些华丽的府邸,以及壮观的大门、花园、湖泊、长满奇异果实的果园,以及在这些地方举行的奢华宴会。其他的里坊被划归给一些特定行业的百姓,如酿酒者、歌舞伎乐、棺槨制作者和殡葬业者、陶瓷工匠、屠夫和店主,此外还有商人,有些商人变成了巨富。据说有富商带着随从从横穿闹市,威仪拟于王者。洛阳居民估计有10.9万户,其中包括3000户左右的胡僧,在洛河对岸的城南四坊中还有粟特人和其他胡人居住的大型社区。

这座繁华的大都市一旦不再作为首都,就被彻底废弃了,直到隋唐再次定都于此才获得新生。

从当时人对北方文化和社会发展水平的一些议论中,可以发现自北魏建立以来的百年之中,社会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在《南齐书》的记载和詹纳尔(W.F.J.Jenner)翻译的《洛阳伽蓝记》引文中,将当时的首都(今天同)描绘为“虜”。宫殿里充斥着货物的制造与买卖,里坊居民中有大量的恶人和醉汉(导致了长达十年的禁酒),以鲜卑习俗敬神,太后与其女子鞍马卫队出行时并不遮面。相比之下,按照南朝人陈庆之的说法,洛阳是一个文明程度很高的地方,陈庆之曾访问洛阳的北魏朝廷,返回建康后有此类评论。他的评论见于杨街之的《洛阳伽蓝记》:“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所谓帝京翼翼,四方之则。”

杨街之还说,陈庆之率先采用了北魏风格的羽仪服式,包括褒衣博带,其他人争相仿效。

至于北朝人对南朝的看法,至少从杨街之的《洛阳伽蓝记》来看,北朝人并没有什么景仰之心。这一点在陈庆之访问洛阳时与北魏高官杨元慎的交流中表露无遗,据称杨元慎有如下言论:江左息患,僻居一隅。地多湿黏,攒育虫蚁,短发之君,无桴首之貌;文身之民,冀戴陋之质。浮于三江,掉于五湖。礼乐所不沾,宪章弗能革。虽复秦余汉罪,杂以华音,复闻楚言,不可改变。虽立君臣,上慢下暴。杨元慎接着又列举了南朝的

《《六朝文明》,[美]丁爱博著,李梅田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7月出版)